

从古典到前沿 秋水共长天一色

——2006 年经济学类专著点评

□李华芳

2006年有两位经济学大师离我们而去，第一位是加尔布雷思，他的长寿与身高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称他为巨人，决不仅仅因为他6英尺5英寸的身高，而是因为他的33本著作展现了一颗真诚而又勇敢的心灵所能达到的高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加尔布雷思文集》与加氏去世是在同一月，这是巧合，出版社似乎也来不及调整宣传策略。但我以为这恰是对加氏最好的纪念了。让一本书带着加氏的思想慢慢发挥其对社会时弊的“抗衡力量”。

加尔布雷思强烈的现实关怀，使他无意中也可能是自觉地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现代经济学的数字化道路是萨缪尔森开创的，萨缪尔森是熊彼特最出色的学生。凯恩斯与熊彼特的恩怨并没有延续到加尔布雷思与萨缪尔森身上，但两种不同的趋向却依然明显。与熊彼特一直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同，凯恩斯更倾向于实际问题的讨论和经济分析，这也是他的《通论》直接针对大萧条的原因。这一点上，加尔布雷思继承了凯恩斯，面向真实世界写作。

实际上，几乎所有20世纪经济学的发展，或多或少与凯恩斯脱不了干系。11月16日，加尔布雷思、凯恩斯的主要批评者离世。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出于对大萧条的恐惧，凯恩斯主义被广泛接受。在凯恩斯如日中天的时候，提出异见的结果可想而知。弗里德曼也曾遭受排挤，曾

经一度苦闷。但他坚持认为虽然凯恩斯看到的通胀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其解释以及政策结论却是错误的。他认为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因此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调节货币数量而不是动用其他的手段。这就是他著名的货币数量论，依然秉承了一贯的简洁风格。

《货币的祸害》是弗里德曼晚年回应自己货币研究的作品，主要理论工作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完成，1963年，弗里德曼与苏珊·施瓦兹合作完成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奠定了弗里德曼与施瓦兹在货币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而这本《货币的祸害》中的另一个主题“通货膨胀”题，也是缘于1963年弗里德曼写就的《通货膨胀：原因与结果》一书。但即便如此，对于专业领域的读者而言，这本《货币的祸害》自有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而且更耐人寻味的是弗里德曼在此书中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他对中国国民党最终溃败的解释也落脚于国民党引发通胀，但是却对适当的终止手段，从对货币的不信任最终导致了国民党的垮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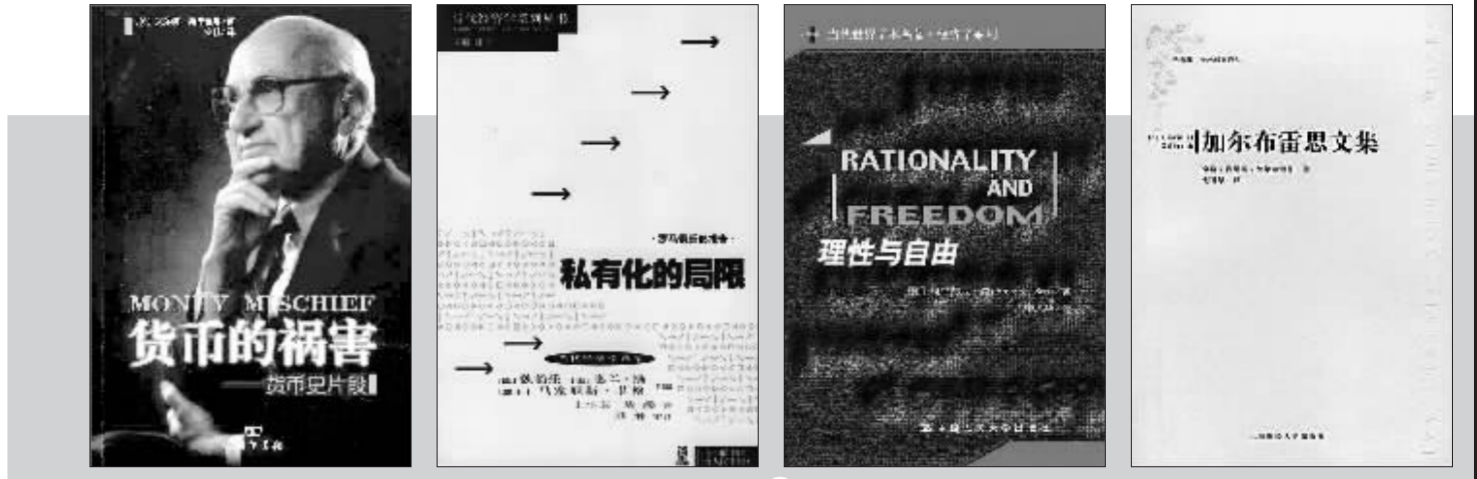
回顾战时的情形也能对当下的转型期有所启示。转型中的重要问题是应不应该私有化，如何私有化。在魏伯乐等向罗马俱乐部提交的《私有化的局限》一书中，为全球化的私有化热浇灌了一盆冷水。魏伯乐等的研究几乎涵盖了通常认为该由政府来供给的所有公共资源。这些私有化的案例有成功也有失败。在总结这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时，魏伯乐开门见山：谨防

极端！因为案例研究显示私有化提高效率降低价格的成功案例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多。这一事实表明，不考虑任何约束条件，而一味鼓吹私有化的极端行为可能仅仅是出于一种单纯的信仰，而不是依靠实证结果来修正自己的理念。

而以此为契机展开的对中国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也凸现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私有化何处为界？在公有私有两分的观点下，往往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案例是两者并存，并且依靠有效的监管框架来有效保护各种产权，并使产权在透明的规则下发挥效率。这一解释摒弃了公私极端，也在最小管制（最小政府）到最强管制（政府包办一切）之间提供了无数连续状态。因为真实世界远比理论要复杂，所以现实中应该寻求的是在公与私之间找到平衡。

除了真实世界问题上的专业分析著作，理论上的深度作品也精彩迭出。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弗兰克·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前后出了两个译本，体现了对这本文著的重视。竞争性均衡条件下是否存在利润，是新古典经济学与质疑者争论的焦点。奈特创新性地将引入了“不确定性”概念，通过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证明了长期均衡条件下利润的存在。这引发了后来的研究者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进一步研究，资产定价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都从奈特处受益匪浅。

理性可以通过概率分析来对付风险，但无法处理不确定性，这可能是因为信息不足等原因所致。



这导致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种是对理性本身的假设做出新闻解释。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巨作《理性与自由》中重新论证了“理性”所依靠的各种局限条件。在森看来，理性之所以无比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对自由的重要意义，而不在于理性对其他社会要求的意义。森关注的理性指导下的政策能不能增进个人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依靠效率或者社会公正的抽象原则。甚至，森认为效率和公正也只能以自由的角度去看待与衡量。森拓展理性的条件，强调了获得自由必须依靠理性；同时森也说明，只有基本能力

获得保障下的自由选择，才能真正促成人们去更深刻地理解自由。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经济学的前沿领域是实验经济学。罗斯·米勒的《实验经济学》通过对金融市场中风险的处理，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人们的心理与股市变化的情况，解释了金融市场兴衰更替的原因。这本略显技术性的书，对投资组合与金融市场的运行机理的解释，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金融市场的内在机制。

总体而言，2006年的经济类专著，从微观到宏观，从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都有佳作面市，如同中国经济一般，更上了层楼。



“我知道，上帝更喜欢你们”

——评说《美国的本质》



《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 and 外交 于歌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葛伟红

1972年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我知道，上帝更喜欢你们”，当时基辛格谨慎地回答说“美国是一个多元而世俗的国家”。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美国是一个多元世俗国家的命题，已是世人心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但《美国的本质》一语揭穿说，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而世俗化则更不是美国的特色。该书中大胆解剖美国，结论石破天惊——“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而实质上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并认为这是美国文化的本质。实际上，这也是被译美国“政治文化乱码”的一把万能钥匙。

应该说，这个结论相当富有启发。实际上，很多国外学者已经论证过，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基督新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国民心理上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据美联社调查，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花在体育娱乐上的时间和金钱要多得多。例如，1990年，美国人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的人数3.88亿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数则为52亿人次；比比比赛的总人次多出13倍；1992年捐给宗教事业的资金总额为567亿美元，而棒球、橄榄球、篮球三大联赛的总收入40

亿美元，两者相差14倍。人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的货币上至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样，美国的“爱国誓词”也说：“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归上帝主宰”。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新任美国总统也必须手按《圣经》，向《圣经》宣誓。显然，这些做法反映着美国人的强烈的宗教情绪。

本书作者于歌自学生时期就潜心研究宗教社会学，“9·11”事件以后，他发现美国外交已经越来越露骨地显露出意识形态外交的特色，基督新教文化在外交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成为美国改造世界的强大意识形态武器。美国将一些国家贬低为“邪恶轴心”甚至是“流氓国家”，而在进攻阿富汗时布什在讲话中还用了“十字军”一词。然而，直到此时国内的大多数学者还在大谈外交中的国家利益因素，并认为这是唯一有力的解释工具。于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阅读美国时陷入了泛利益论的泥沼。

于歌认为，国家利益理论不能涵盖偏重意识形态国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盖宗教影响强烈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外交，利益论不能解释这些国家外交的实质与目的。不过，在美国，“意识形态”却是一个贬义词，它受到蔑视，被视为“旧世界”的狭隘和狂妄自大的副产品。但于歌显然认为，在事实上这种东西也属于美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意识形态始终是美国社会异常活跃的精神力量。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于歌的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比如，美国人一直把人权当作一个重要的外交要价，在其外交活动中，习惯性地要求对方改善人权状况。在最近的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美国人又将朝鲜的人权问

题提出来，要求获得一揽子解决。美国人又坚持世界上的国家都应该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要求别的国家采取西方式民主主体制，并不惜投入它大量的资源来促进世界的民主化。在原东欧国家地区，美国不断挑起“颜色革命”；对非洲贫穷国家的债务免除上，美国以民主化实现与否为条件，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美国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来实现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

从利益论来讲，别国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权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依照利益论的逻辑，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只要别国政府支持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即可，而不必管该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一个最简单的算计是，人权外交、民主外交容易造成很多国家的反弹，甚至可能产生对立面或敌对势力，从而影响到自己国家在国际上实现国家利益。但美国人却不按照这个逻辑办事。

于歌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充当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保护人的角色，实际上是在推行和保护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制度，旨在全球建立一个基督教文明的国际秩序。于歌还强调，“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美国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美国的外交实质，明白其真正的外交目的，也才能明白中美关系的实质及走向。政府才知如何与这个世界的巨无霸大国打交道，我们的国人才知道怎样与美国人相处”。

可是，长期以来在美国部分神学家那里有一种见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撒旦因素：“中国人千百年崇拜拜龙，视蛇为神物，而龙和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撒旦的象征”。于歌认为，这预示着中美之间文化冲突的深刻根源。这就回到于歌写作本书的最终目的：通过认识美国的本质达到最终认识中美关系本质，最终做出对美外交的正确决策。这也是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该书给人的一个最大启发和警示。

■新书过眼

《乔致庸的经济学》

商场何以是战场？怎样应对现金流危机的危机？为什么绝不跟银子生气？为什么要走西口？商战底线是什么？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时候，百年前因票号而盛极一时的晋商成了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热点。而晋商杰出人物乔致庸先生的创业经历和“汇通天下”的经营思想，自然是其中一座有待深入挖掘的富矿。有企业家总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北大研究员这样三个人，以三种视角，评点晋商之道兴衰的经济学原理，透析《乔家大院》沉浮的文化现象，并由此引发对当今生活的种种感受和理解。他们的智力碰撞汇成了本书。也可以说，他们各自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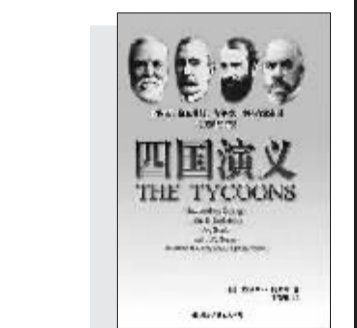
郭梓林 著 韩朝华 熊宏屏 评 海南出版社 2006年12月出版

企业家作用、对商战的剖析，在当今中国非常有代表性；“企业家的创新空间是无限的，你死我活不必须是商战结局的唯一选择。”“凡把商场比作战场的书或文，多数层次较低。真正成功的商业秘诀在于共赢，互惠。”

《三国演义》

——卡内基、洛克菲勒、古尔德、摩根商业帝国与美国经济史

是律师、记者，曾经还是银行家的查尔斯·莫里斯在本书中复活了美国镀金时代的四位巨人：欲望无边而又无情的竞争者卡内基，领导着庞大石油帝国、沉着冷静而又睿智的工程师洛克菲勒，躲在幕后操控市场的高手古尔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金融巨子J.P.摩根。前三人着迷于发展、尝试和速度；只有一个信条——更低价格、更多数量和更大市场份额。与这三个人相反的是摩根这位有着贵族血统的银行家。他为了美国商业努力攫取全球的信心，阻止了卡内基、洛克菲勒和古尔德急速膨胀的野心，挽救美国于金融灾难之中。这四个巨



(美)查尔斯·R.莫里斯 著 李宏强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12月出版

人既充满魅力又各有缺点，他们是19世纪美国经济迅猛增长时期站在幕后的大亨，而正是这一时期美国在日后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富有、最具创造力、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莫里斯带我们深入地走进这些巨人的王国，揭示他们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核心基础遭伤害 未来发展实堪忧



《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 汪丁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出版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汪晓波

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在较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一个逐渐转轨形成的市场经济体系虽不彻底，但正在走向完善。市场经济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体制变化释放出的巨大力量，毫无疑问，促使中国发生了眩目的变化。当然，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进步。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时，社会领域的问题也急剧呈现出来。就在前几天，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中，列举出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不和谐之处。比如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与最低收入者，实际收入差距达到18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在向纵深发展；医疗卫生、就业等方面问题也不乐观，如此等等。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凸显，是

中国社会若隐若现的道德危机。道德基础的脆弱，消解着中国转轨经济健康地走向未来的实际能量，也在一个侧面干扰着社会矛盾的解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需要有支撑其自身的道德基础——这样一个命题并没有真正被认同。

在知识界，或许多数人倾向于同意，道德基础并不是市场经济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但杂音依旧不难听到。一些激进的自由经济学家并不愿意在效率之外更多地谈论道德，或者干脆认为道德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显然，在实践当中，情况更为糟糕些。人们可以常见的是，经济生活领域出现了大量失范行为，民众的信用观念还很落后，企业家的商业伦理也亟需补课，劳资关系方面不尽和谐。

可以肯定，如果不能改善当下的道德生态，那么，发展中的市场经济还只是一个并不健康的肌体。长此以往，中国社会的进步势必会被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正如北京大学经济学家汪丁丁所称，“或许由于过去10年内目睹了普遍的道德沦丧和足以导致经济崩溃的欺诈行为，我们对于这一点有格外深切的感受”。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汪丁丁教授较早关注到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也是长期坚持在这个领域探索思考的思想者。早在十多年前，他就从理论层面阐述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之间的相关命题。近年来，他又着力

于实证性的研究，关照中国现实的医疗、教育、新闻业等等，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寻找合适的道德根基。汪教授多年来的思考，现在摆在了我们面前，也就是这本《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

在汪丁丁的理解里，市场经济是分工合作的秩序不断扩展的过程，而这个秩序的道德基础是分工的人们对产权的尊重。这一论点，今天看来并不新鲜，但若是考虑到十多年前作者刚提出时的社会环境，还是能够体悟到其中的时代意义。所谓“扩展秩序”并非汪丁丁的发明，那是哈耶克的成果。发展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哲学，这是哈耶克中晚年研究的重心所在。汪丁丁则站在哈耶克的肩膀上，深入研究了哈耶克的道德哲学之后，将问题的场景搬到中国。

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和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显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一个明显的差异是，中国缺少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基督教传统，也缺少法治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基础也会有根本的不同。比如，汪丁丁举例说，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社会，都重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东西方社会的共性要求，正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律。

在笔者看来，汪丁丁对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生态的追问，比他的理论探索更为出色。他尖锐地指出，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分崩离析，但是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远未确定。汪丁丁这样估计：如果说

1980年—2000年期间是传统价值体系瓦解的阶段，那么未来的20年很可能将是价值完全失落的阶段。这一判断是否经得起考验，尚可推敲。但是，许多有识者的确也从政府官员、企业以及普通民众的诸多行为中，看到了道德的脆弱性甚至道德危机。尤其是汪丁丁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义利之辨，表现出了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难能可贵。

诸多的东西方思想者对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这个命题有过思考。在这个群体当中，汪丁丁算得上最有原创精神，也谈不上研究最为系统。但仔细翻阅这本书，我不能不承认，汪至少可以称得上自成一家。当然，他的思考的确不够全面。比如，他忽略了道德资源亦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单从社会信用角度来看，普遍的社会伦理信任可以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或“额外交易成本”。换一个角度看，“交易成本”的降低正是缺少法治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基础也会有根本的不同。比如，汪丁丁举例说，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社会，都重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东西方社会的共性要求，正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律。

在笔者看来，汪丁丁对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生态的追问，比他的理论探索更为出色。他尖锐地指出，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分崩离析，但是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远未确定。汪丁丁这样估计：如果说